

绪论：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辉煌成就

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是中西军事文明互相融合的产物。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则是其赖以发展的基础和土壤。要深刻理解中国近代军事思想，就必须追本溯源，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过程，及其所曾达到的高度有所了解。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，在本书开篇之前，有必要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梗概作一介绍。

由于这一问题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很大，为了叙述简明起见，将中国古代分作远古（先秦）、中古（秦汉至五代）和近古（北宋至清前期）三个历史阶段。

军事思想的发展，离不开整个军事实践活动。为了读者对各个阶段的军事活动有个印象，在叙述每个阶段的军事思想之前，对军事活动均作简要的概述。由于军事思想新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，为了保持军事思想发展的连贯性，在介绍每个阶段军事思想时，大体上分作战争观、战争制胜因素、建军治军思想以及作战指导原则等四个部分来加以叙述。

一、远古（先秦）军事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

中国是世界上四大古文明发祥地之一，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在人类历史上，战争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。只是到了原始社会的晚期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，氏族或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料，不断发生冲突，最终激化为流血的暴力，这就是初始的战争。自此以后，部落中逐渐分离出专门从事战争

的群体，这就是初始的军队。与此同时，一些生产工具转化为专门用于作战的器械，这就是初始的武器。大约距今 4000 多年，黄帝与蚩尤两大部落联盟间进行的涿鹿之战，标志着战争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。

约于公元前 21 世纪，夏代建立，国家开始形成，并建立起以奴隶主贵族为骨干、以平民为基础的军队。这时的军官由部落首领担任，平时治理民事，战时指挥作战。士兵也兵农合一，居则为民，战则为兵。当时的作战方式是徒步格斗，步兵是主要兵种，军队最大的建制单位是“旅”。这时的兵器多用石、骨、木、角制造，并开始出现青铜制造的戈、钺、戚、镞。战车也开始出现，在夏后氏与有扈氏争夺王权的甘之战中，就有使用战车的记载。考古发掘还表明，夏代建立之后，为巩固其统治地位，已开始构筑王城等较大的城池。

公元前 16 世纪初建立商朝，军事力量不断扩大，除了王室拥有军队外，各诸侯、方国乃至贵族也都有自己的武装。商朝军队的兵种有步兵和车兵。在前期，步兵仍是主要兵种，编制基本上是十进制、最高的建制单位是“师”。到了商代后期，战车数量大大增加。由于战车在速度和冲击力方面表现出原始步兵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，战斗形式也由徒步格斗逐步过渡到车战。在商灭夏的鸣条之战中，商汤曾率领 70 辆战车攻夏，表明战车已登上战争舞台。而到了商朝末年的牧野之战中，周武王率领的战车已达 300 乘，可见车战已成为当时重要作战形式。商朝军队中的士兵，来自下层贵族和具有自由民身份的“众”，奴隶没有当兵的资格，仅充军中杂役。在前期和中期，兵员大体实行临战征集，到了后期，已开始向固定兵员方式转变。商代是青铜文化的高峰，战车是当时的主要武器装备。这时的战车都是木质的，有统一的形制，均装有青铜件，独辕、双轮、方舆、专轂，以轭驾马，一般为两匹，车士三人，一人御车，两人作战。进攻兵器为弓箭，箭上已装有

青铜镞；格斗兵器是青铜矛、钺、短剑；防御装具已有青铜胄。在通信方面，各地已建有驿站，据卜辞记载，边境军情报告已定程传送，说明驿传制度已经产生。在筑城方面，版筑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城墙的构筑，据对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的发掘考察，其城外已挖有壕沟，宽达 10 米，这是已发现的墙壕并用最早实例。由于城墙的出现，攻城器械也随之产生，在商末周灭崇之战中，周文王已使用钩援（早期的云梯）、临冲（后世的冲车）等攻城器械。

公元前 11 世纪，西周代商。这时，军事制度进一步完善，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，军权集中于天子。天子之下，由太师辅佐天子指挥军队，并开始设立“司马”官职，主掌军务。其武装力量的构成，除了灭商前的“西六师”之外，又建有“殷八师”，以资镇抚。与王室军队并存的，还有诸侯武装，其规模比王室军队要小。《周礼·夏官·司马》中有“王六军，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”之说。到了西周，车战已居主要地位，车兵成为主要兵种，军队的编组以战车为主体，由甲士、徒兵、杂役组成“乘”，每“乘”战车一辆，一般由二匹或四匹马驾挽，兵员数量为 10 人（也有 12、25、30 人之说），其中 3 人居车上，7 人居车下。⁵ 乘组成一个作战单位。到了西周后期，周宣王南征荆楚，所率兵车达 3000 余乘。由于马匹在战争中地位重要，西周开始设置专门职官，掌管马匹的饲养和训练。由于青铜冶炼技术的提高，传统兵器的外形有所改进，性能有所提高，并创制出戟、剑等新兵器。在信息传递方面，开始建立起烽火台和邮驿，进行接力通信。烽火台报警的方法是：一旦发现敌情，白天施烟，夜间举火。

到了春秋时期，周王室衰微，天子丧失昔日的权威，成为名义上的共主，一些诸侯大国打破限制，纷纷扩军，致使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变为“自诸侯出”和“自大夫出”。春秋武装力量，大体沿袭西周的体制，周王室军队由周天子掌握，参加对外征战，但力量渐弱，地位下降；活跃于战争舞台的，主要是诸侯武装，包

括公室军、地方军、私属军和禁卫军⁴部分。各国国君之下，卿大夫既掌握政务，也统率军队；到了春秋末期，出现了专任高级武官的将军，文武开始分职。这时的兵种构成，有车兵、步兵和舟师兵，车兵达到鼎盛。以车兵和步兵相结合的车乘之数，仍是衡量各国武装力量强弱的标志。前期诸侯大国一般拥有千乘之数，到了后期，一般诸侯国也拥有千乘，一些诸侯大国如晋、楚，已拥有 5000 乘以上。春秋后期，急剧的社会变革，以及作战方式的改变和作战地域的扩大，开始了车兵由盛而衰的过程。郑国最早单独使用步兵作战，后来晋国大夫魏舒，在与无终、翟（狄）兵的遭遇战中，“毁车为行”，放弃战车，组成步兵方阵，终于击败狄兵，开了中原地区改车兵为步兵的先河。这时，地处南方水网地带的楚、吴、越诸国，开始组建舟师。公元前 549 年，楚以舟师攻吴，这是舟师作战的最早记载。公元前 485 年，吴国派徐承率舟师从海上攻齐，开创舟师出海作战的先例。军队的组织编制，“军”是最高建制单位，军以下的编制，各国不尽相同，晋国实行军、师、旅、卒、两、伍⁶级编制；齐国则实行军、旅、卒、小戎、伍⁵级编制。到了春秋中期，兵役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，晋国首先打破“国人”与“野人”的界限，开始在鄙野地区征招兵员。军队的装备仍是战车和兵器，较前在形制上有所改进，质地有所提高，新出现的武器装备是用于瞭望的“巢车”。

到了战国时期，将相分职是一个突出的特点。即在国君之下，设将、相之职，分别掌管军事和政务。将军有带兵之权，决策与调动权仍操之于国君。伴随着将军的设置，独立的军事领导系统开始出现，将帅已有幕僚机构，据《六韬·龙韬·王翼》载：“将有股肱羽翼⁷²人”。这时步兵已成为作战的主力，车兵依然存在，但已退居次要地位，只是协同步、骑兵作战。骑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已经出现，赵国武灵王为对付胡人的进犯，实行“胡服骑射”，率先组建骑兵部队，各国相继仿效，骑兵成为新兴的精锐兵

种，在作战中显示出威力。战国时普遍实行郡县征兵制，即以郡县为单位，征集农民当兵。同时开始选练勇士，组成精锐军队，并逐渐出现募兵制度。这时，青铜兵器的形制有所改进，强弓劲弩大量使用，并发明了“连弩”。为了适应骑兵发展的需要，各国都设立马苑，建立起军马管理制度。

总之，到了战国时期，军队已建设得相当完备。各诸侯国均已建立起指挥体系，从兵种构成而言，已拥有步兵、车兵、骑兵和舟师。为了保证兵源，各国已实行了郡县征兵制或募兵制。此外，军训制度、军功爵制以及后勤保障制度也已建立起来，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建军治军原则，从而能保证军事任务的遂行。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发生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，不仅规模扩大，而且战斗激烈，将帅的指挥艺术也较前提高。据统计，自有史料记载到战国末年，共发生大小战争 665 次^①，出现了如牧野之战、长勺之战、城濮之战、柏举之战、桂陵之战、马陵之战、即墨之战、长平之战等著名战例。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，战争指导者采用种种谋略，如示形诱敌、设伏歼敌、城邑攻防、迂回包抄、退避三舍、后发制人、先发制人、突然袭击、以少胜多、分进合击、远程进攻、渡江奇袭、“围魏救赵”、围困歼敌、乘虚捣隙、半渡而击等，合纵连横、远交近攻等政治谋略，也被常常采用。以上这些丰富多彩的军事实践，造就了一批著名将帅和军事家。所有这些，都为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，提供了坚实基础。

二、辉煌的远古（先秦）军事思想

在远古时代，日益频繁而多彩的军事实践活动，为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第一性的物质基础，为人们探讨和总结军事与战争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素材，而日益紧迫的军事斗争形势，也

^① 《中国军事史·历代战争年表（上）》，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版，第 3 页。

对撰写兵书提出了客观需求。于是，作为军事思想主要载体的兵书也就应运而生。据记载，早在西周就产生过《军政》、《军志》两部兵书（均已亡佚）。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百家争鸣的社会氛围，造就了一批专门论兵的兵家，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孙武、司马穰苴、吴起、孙臆、尉繚等，著名的兵书有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孙臆兵法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六韬》等。当时，不仅兵家论兵，几乎所有的诸子百家，也都对军事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，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军事思想的内容。新近出版的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》，收录的论兵诸子有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墨子、管子、荀子、鹖冠子、鬼谷子、韩非子等 9 人，以及《周易》、《逸周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经法》、《商君书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战国策》等 7 部非兵书著作。现将上述诸子百家关于论述军事思想的内容，分作战争观、战争制胜因素、建军治军思想、作战原则等四个方面，加以扼要的介绍。

1. 关于战争观

战争为何物？远古的人们，经历过长年累月的战争实践之后，已经开始有所认识，并力图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加以解释。一般来说，对于战争的态度，兵家比较现实，主张加以正视，正确对待。如孙武说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^①他既不一概排斥，也不一味歌颂，而主张取慎重态度，他说：“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。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怒可以复喜，愠可以复悦，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。故明君慎之，良将警之，此安国全军之道也。”^②孙臆也主张对战争取正视的态度，他说：“夫兵者，非士恒势也。此先王之传道也。战胜，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；战不胜，则所以

① 《孙子兵法·计篇》。

② 《孙子兵法·火攻篇》。

削地而危社稷也。是故兵者不可不察。然夫乐兵者亡，而利胜者辱。兵非所乐也，而胜非所利也。”^①

但是，随着诸侯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和残酷，人们常年处于战争环境中而苦不堪言。于是，人们往往把一切罪恶归之于战争，这种非战、反战情绪也反映到诸子百家的头脑而生出各种议论。于是老子认为：“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为上。”^② 孟子则主张“善战者服上刑”，他鉴于战争的残酷，“争地以战、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、杀人盈城。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于死。故善战者服上刑”^③。墨子则提倡兼爱，主张非攻。这些议论都从一个侧面，反映了人们的战争观。

对战争的起因，也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之一。吴起分析得比较详细，认为战争起因有五，即“争名，争利，积恶，内乱，因饥”。而《经法》则概括为三条，即“有为利者，有为义者，有行忿者”，当然显得不够全面。

对战争这种社会现象解释得比较清楚，观点比较辩证的，则是义战主张。它从分析战争性质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入手，然后再确定赞同还是反对，这就是孙臆所说的“义者，兵之首也”。那末，“义”是什么呢？吴起下了个定义：“禁暴救乱曰义。”荀子也说：“兵者，所以禁暴除害也，非争夺也。”这就是说，凡是禁暴、救乱、除害的战争，就是正义战争，就加以赞同支持；反之，就加以反对。对战争性质阐释得最为明确的，要推《司马法》，它一方面强调“国虽大，好战必亡”，同时又指出：“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”。他并不一概的排斥战争，而视战争的性质而定，“杀人安人，杀之可也，攻其国，爱其民，攻之可也；以战止战，虽战

① 《孙臆兵法·见威王》。

② 《老子·三十一》。

③ 《孟子·离娄下》。

可也。’^①这种以战止战的观点，是很有辩证头脑的。对战争的态度，关键在于是否正义，正如《吕氏春秋》所说：“兵苟义，攻伐亦可，救守亦可；兵不义，攻伐不可，救守不可。”

综上所述，先秦各派学者对于战争的态度虽有所不同，但主张慎战、义战则是主流。

2. 关于战争的制胜因素

所谓战争的制胜因素，亦即战争胜负取决于哪些因素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战争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技和地理环境的关系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先秦诸子百家已有较为全面的认识。孙武认为，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五，即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等五个方面。他还进一步阐述说：“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得？法令孰行？兵众孰强？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吾以此知胜负矣。”^②司马穰苴则将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概括为“五虑”，即“顺天、阜财、怗众、右兵、地利”^③。孙臆则提出：“上知天之道，下知地之理，内得民之心，外知敌之情，阵则知八阵之经，见胜而战、弗见而诤。”^④认为若能做到这些方面，就懂得了取胜之道。以上这些论述，其内容大同小异，不外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地理环境等方面。下面，拟将诸子百家的有关论述，分别加以介绍（有关战争与军事的关系，留待下节专门介绍）。

政治因素对战争的制约作用，是最早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问题。《军志》中说：“有德不可敌。”孙武说：“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。”吴起也认为，国家安危，“在德不在险”。《文子》则认为，“兵之胜败皆在于政”。孟子则说“仁者无敌”^⑤，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”，以及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。这里所说的

① 《司马法·仁本》。

② 《孙子兵法·计篇》。

③ 《司马法·定爵》。

④ 《孙臆兵法·八阵》。

“德”“道”“政”“仁”“人和”等，都含有政治的意思，可见诸子百家已认识到政治在战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。关于政治与军事的关系，尉繚有一段精辟的论述，他说：“兵者，以武为植，以文为种，武为表，文为里。”^①显然这里已含有政治是军事的根本的意思。

关于经济与战争的关系，孙武有详尽的论述。他鉴于每次战争都要千里馈粮，日费千金，消耗巨大，由此得出结论说：“军无辎重则亡，无粮食则亡，无委积则亡。”^②充分阐明了军事对经济的依存关系。管仲也指出：“国富者兵强，兵强者战胜，战胜者地广。”又说：“兵不强不可以摧敌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。”^③明确阐明了国富与兵强、经济与战争的关系。《商君书》则从国富兵强的依存关系出发，主张通过奖励“耕战”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。

地理条件对战争也有重大影响。《军志》说：“失地之利，士卒迷惑，三军困败。饥饱劳逸，地利为宝。”《孙子兵法》“地形”、“九地”、“军争”诸篇中，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地理条件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。它的基本观点是：“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料敌制胜，计险阨远近，上将之道也。知此而用战者必胜，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。”^④孟子所说的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，也把地理条件放到了适当位置。

关于科学技术对战争的影响，兵家与诸子也有所论述。孙子说：“兵无辎重则亡。”《六韬·虎韬》也说：“凡三军有大事，莫不习用器械。”又说：“三军用备，主将何忧？”墨子则认为：“库无备兵，虽有义不能征无义，城郭不备全，不可以自守。”^⑤这些

① 《尉繚子·兵会上》。

② 《孙子兵法·军争篇》。

③ 《管子·治国》。

④ 《孙子兵法·地形篇》。

⑤ 《墨子·七患》。

都表明，武器装备的精良与充足与否，对战争胜负有直接的关系。我们还可看到，在上古的历史上炼铜技术的发明，使铜制兵器取代了石制兵器；炼铁技术的产生，又使铁制兵器取代了铜制兵器。这些技术进步会对兵器的改进产生了重大变化，而先进兵器的优先采用，曾使拥有的一方在战争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，从而给战争胜负带来了重大影响。

3. 关于建军治军

建军治军，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，诸子百家对此极为重视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他们是从选将、练兵两个方面加以论述的。

春秋、战国时期，将帅已是专门的军职，直接领导着军队建设与作战，因此，《六韬》说：“得贤将者，兵强国昌；不得贤将者，兵弱国亡。”把将帅的贤愚，提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。那末，一位“贤”的将帅要具备哪些条件呢？孙武说：“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”而要具备这五个方面的条件，还要有“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民是保”的思想境界。《六韬》则提出将帅要具备“五才”，即“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也。勇则不可犯，智则不可乱，仁则爱人，信则不欺，忠则无二心”^①。与孙武所提要求大同小异，只是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。

建军治军的另一项任务是训练部队。吴起说：“用兵之法，戒教为先。”司马穰苴说：“士不先教，不可用也。”孔子也主张教而后战，反对“以不教民战”。那么，怎样训练部队呢？孙武主张“令之以文、齐之以武”，做到恩威并施，“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，不服则难用也；卒已亲附而罚不行，则不可用也。”^②尉繚说：“善将者，爱与威而已。”就是赏罚严明。吴起提倡“进有重赏，退有重刑，行之以信”。司马穰苴主张“赏不逾时，罚不迁列”，孙臆

① 《六韬·论将》。

② 《孙子兵法·行军篇》。

也力主“赏不逾日，罚不还面”。总之，经过训练，要使部队做到“居则有礼，动则有威，进不可当，退不可追，前却有节，左右应麾，虽绝成阵，虽散成行。与之安，与之危，其众可合而不可离，可用而不可疲。投之所往，天下莫当”^①。若能训练成这样的部队，就战无不胜。

4. 关于作战指导原则

经过常年而频繁战争实践，人们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教训，这些经验教训经过将帅和军事家的思索整理，逐渐上升到理论的高度，形成了一系列指导作战的原则。在这方面，孙武集先人战争经验之大成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谋而后战原则：即在投入战斗之前，将帅们要进行充分的谋划。孙武强调要进行“庙算”，即在兴师作战之前，要在庙堂举行会议，谋划作战大计，预计战争的结局。他说：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无算乎！吾以此观之，胜负见矣。”^②尉繚也强调“庙胜”，主张“先料敌而后动”。他说：“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，以计其去。兵有备阙，粮食有余不足，校所出入之路，然后兴师伐乱，必能人之。”^③庙算的基本方法是弄清敌我双方的情况，情况明才能决心大。故孙武力主要做到“知彼知己”，他说：“知彼知己者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”^④管仲也十分强调弄清敌情，他说：“不明于敌人之政，不能加也。不明于敌人之情，不可约也。不明于敌人之将，不先军也。不明于敌人之士，不先陈也。是故以众击寡，以治击乱，以富击贫，以

① 《吴子·法兵》。

② 《孙子兵法·计篇》。

③ 《尉繚子·兵教下》。

④ 《孙子兵法·谋攻篇》。

能击不能，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。故十战十胜，百战百胜。”^①由此看来，弄清敌情，谋而后战，应是一条普遍适用的作战指导原则。

兵不厌诈原则：战争是敌我双方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时所采取的最后手段，是无仁义道德可言的，故孙武提倡兵不厌诈。他说：“兵以诈立。”又说：“兵者，诡道也，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，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。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也。”^②孙武在提出了“示形”¹²法之后，又提出了“奇正”、“虚实”两个重要范畴，作为实施“诡道”的基本方法。什么是“奇正”呢？孙武说：“三军之众，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，奇正是也。”又说：“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故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。……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。”^③何谓“虚实”呢？孙武说：“兵之所加，如以碁投卵者，虚实是也。”又说：“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避高而趋下；兵之形避实而击虚。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。”^④管仲也主张“避坚乘瑕”，他说：“凡用兵者，攻坚则韧，乘瑕则神。攻坚则瑕者坚，乘瑕则坚者瑕。故坚其坚者，瑕其瑕者。”^⑤司马穰苴也主张：“凡战击其微静，避其强静；击其倦劳，避其闲窹；击其大惧，避其小惧，自古之政也。”^⑥吴起也说：“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。”他

① 《管子·七法》。

② 《孙子兵法·计篇》。

③ 《孙子兵法·势篇》。

④ 《孙子兵法·虚实篇》。

⑤ 《管子·制分》。

⑥ 《司马法·严位》。

还列举了 13 种可击的时机，6 种应暂退避的情况，将“避实击虚”原则加以具体化了。总之，示形、奇正、虚实，都是实现“兵不厌诈”的手段。

集中兵力原则：孙武对这个问题阐释得深入浅出，透彻明了，他说：“形人而我无形，则我专而敌分；我专为一，敌分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，则我众而敌寡；能以众击寡者，则我之所与战者约矣。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，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；敌所备者多，则吾所与战者寡矣。故备前则后寡，备后则前寡，备右则右寡，备左则左寡，无所不备，则无所不寡。”^①他又说：“兵非益多也，惟无武进，足以并力、料敌、取人而已。”“并力一向，千里杀将，此为巧能成事者也。”其中“并力”也是集中兵力的意思。关于集中兵力的思想，其他兵家也有所论列，只是不如孙武论述得集中透彻。如司马穰苴认为：“凡阵、行惟疏，战惟密，兵惟杂。”^②其中“战惟密”就含有集中兵力的意思。孙臆也主张“并卒而击之”，“能分人之兵，能按人之兵，则镞铄而有余。不能分人之兵，不能按人之兵，则数倍而不足”^③。也含有“我专敌分”之意。

力争全胜原则：关于用兵的原则，孙武提出了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理想境界和最高标准。他说：“凡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，……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”为此，他又提出了“上兵伐谋”的思想，他说：“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毁人之国而非久也，必以全争于天下，故兵不顿而利可全。”^④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当然要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，为此，孙武提出了一系列进行战备的主张，如说：“善战者，先为

① 《孙子兵法·虚实篇》。

② 《司马法·定爵》。

③ 《孙臆兵法·客主人分》。

④ 《孙子兵法·谋攻篇》。

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”“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也；无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。”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”其他兵家对此也有所论述。如《六韬》说：“全胜不斗，大兵无创。”“善战者不待张军。善除患者理于未生。善胜敌者胜于无形。上战无与战。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，非良将也。”《六韬》中还列有“文伐”¹²法。这些内容，也含有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意思。总之，若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，在知彼知己的情况下，充分运用计谋，是完全可以达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全胜目标的。

上面，我们先后谈到了战争观、战争制胜因素、建军治军以及作战指导原则等四个方面先秦诸子的有关论述，从中不难看出，军事思想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，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体系，为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三、中古（从秦汉到隋唐）军事思想的发展

公元前 3~10 世纪中期，即自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之时起，迄于五代，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。在此 1100 余年间，曾经历了汉唐盛世，中国的经济、政治、科技、文化均有很大的进步，与此同时，军事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。由于冶铁技术臻于成熟，不仅青铜兵器为钢铁兵器所取代，而且各类兵器的质量有较大提高，在形制上也有发展变化，如格斗兵器的种类增多，远射兵器出现了强弩、车弩和床弩，防护装具出现了铁铠等。随着骑兵的大发展，出现了重装骑兵以及与之配套的鞍、镫。与水军的发展相适应，造船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，出现了能载上千人的大型楼船。筑城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，出现了绵亘万里的长城和长安都城。水陆交通方面出现了沟通全国的驰道、直道和运河。

这一时期，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相适应，建立起了军权高度集中于皇帝的军事体制。在兵种结构上，车兵逐渐退出战争舞台，步兵、骑兵上升为主要兵种，管理军马的机构应运而生。水

军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在兵役制度方面，先后施行过征兵制、世兵制、府兵制和募兵制。后勤保障，除了统一供应外，军屯得到了大力的推广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军事的进步，战争的规模增大了，时间延长了，区域扩大了，特别是发生了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、水上交战、横渡江河作战，以及水陆协同作战，产生了如成皋之战、井陘之战、漠北之战、昆阳之战、官渡之战、赤壁之战、淝水之战和虎牢之战等著名战例。同时还造就得像项羽、韩信、刘秀、曹操、诸葛亮、石勒、苻坚、刘裕、李世民、李靖和郭子仪等一批著名将帅。所有以上这些军事活动，都为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。

秦汉以后的军事思想，是在先秦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由于先秦时期的战争形态已得到较充分发展，军事谋略已被广泛运用，加之当时百家争鸣的开放的学术气氛，由此造就了一批军事家，将军事思想一下子提高到相当完备、高超和成熟的程度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焚毁图书，销熔兵器，加之汉武帝又独尊儒术，遂使百家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，致使秦汉以后的各朝各代的将帅们，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了对先秦军事思想遗产的整理、消化和应用上。因此，这一时期产生的兵书不多，比较著名的仅有《三略》、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、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、《太白阴经》等少数几部。下面我们将看到，这个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于整理、研究和注释先秦兵书的过程中实现的，较前人增添的新的军事命题和论断不多。

1. 关于战争观

这个时期的军事家主要继承了先秦军事家“义战”的思想。如《三略·下略》说：“圣王之用兵，非乐之也，将以诛暴讨乱也。夫以义诛不义，若决江河而溉燬火，临不测而挤欲堕，其克必矣。”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也说：“兵之来也，以废不义而复有德也。”

《太白阴经·善师篇》则说：“兵非道德仁义者，虽伯（霸）有天下，君子不取。”可见都主张义战，反对不义战争。

关于战争起源，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作了颇具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，它说：“人有衣食之情，而物弗能足也。故群居杂处，分不均求不赡则争，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。”比之吴子所说的“争名、争利、积恶、内乱、国饥”来，要更本质些、深刻些。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还说：“夫兵者，所以禁暴讨乱也。……教之以道，导之以德而不听，则临之以威武；临之以威武而不从，则制之以兵革。”也颇有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”的含义。正是这些内容，是比先秦军事思想家更为明确而深刻的地方。

2. 关于战争制胜因素

这个时期的军事思想家对战争制胜因素作全面分析的不多。

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说：“德均则众者胜寡，力敌则智者胜愚，势侔则有数者禽无数。”对德均、力敌、势侔情况下胜负的分析，颇具新意。它又说：“为存政者，虽小必存；为亡政者，虽大必亡。”最后，它概括说：“兵之胜败，本在于政。”充分强调了政治因素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。

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关系也得到了特别的强调。《三略·上略》提出：“与众同好靡不成，与众同恶靡不倾。治国安家，得人；亡国破家，失人也。”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也说：“众之所助，虽弱必强；众之所去，虽大必亡。”充分论述了人心向背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。

天时、地利因素也被置于适当的地位。《太白阴经·地无险阻》说：“天时不能佑无道之主，地利不能济乱世之国。”也充分表示了人的因素比之时、地利因素更为重要。总之，以上这些论述，都从一个侧面对战争制胜因素作了重要的论述和强调。

3. 关于建军治军思想

这一时期的建军治军思想，主要在训练、赏罚、论将等三方

面有所论述与发挥，尤其对士兵的训练问题有较多的强调。汉武帝说：“用兵之法，不勤不教，将率之过也；教令宣明，不能尽力，士卒之罪也。”^① 诸葛亮说：“军无习练，百不当一；习而用之，一可当百。”^② 又说：“有制之兵，无能之将，不可以败；无制之兵，有能之将，不可以胜。”^③ 他认为士兵是否训练有素，比之将帅是否有能力更为重要。

将帅的修养也引起了特别的重视。《三略·上略》提出，将帅要达到“十二能”，即“将能清，能静，能平，能整，能受谏，能听讼，能纳人，能采言，能知国俗，能图山川，能表险难，能制军权”。又说：“将帅者，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，敌乃可加。……与之安，与之危，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，可用而不可疲，以其恩素蓄、谋素合也。故曰，蓄恩不倦，以一取万。”诸葛亮则要求将帅具备“五善四欲”，即“五善者，谓善知敌之形势，善知进退之道，善知国之虚实，善知天时人事，善知山川险阻。四欲者，所谓战欲奇，谋欲密，众欲静，心欲一”^④。又说：“善将者不恃强，不怙势，宠之而不喜，辱之而不惧，见利不贪，见美不淫，以身殉国，壹意而已。”应该说，这些要求是很高的，要做到是不容易的。这些要求，比之先秦军事家的论述，要具体而全面。

刑赏继续受到重视。《三略·上略》认为：“军以赏为表，以罚为里，赏罚明则将威行。”《太白阴经·人无勇怯》则认为，人本无所谓勇怯，只要施以刑赏，就可成为勇士。它说：“勇怯在乎法，成败在乎智，怯人使之以刑则勇，勇人使之以赏则死，能移人之性、变人之心者，在刑赏之间。”对如何实施刑赏，也有一些很有见地的论述。如诸葛亮主张“赏不遗远，罚不阿近，爵不可

① 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

② 《将苑·习练》。

③ 《诸葛亮集·兵要》。

④ 《将苑·善将》。